

The New Page

冷战之后

费德里科·马约尔 著

(T·福斯坦泽协助)

I·普利高津 序

闵家胤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之后/(西班牙)马约尔(Mayor, F.)著;闵家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0

书名原文: The New Page

ISBN 7-5004-2169-9

I. 冷… I. ①马… ②闵… III. 国际形势-研究
IV. D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119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 插页: 3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序 言

为 《冷战之后》(The New Page) 撰写一篇短短的序文是莫大的荣幸。这是篇充满激情的辩护辞，为战争文明可能会被和平文化取代的未来辩护。在传统上，我们的世界一直被分割成众多独立的国家，它们采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追求自身的利益。然而，诸如康德和威尔逊在过去就梦想过这样的时代，这种悲惨的局面将通过国际组织采取的行动得到改变。那时，战争将被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举行的谈判取代。

费德里科·马约尔强调，历史的步伐不是渐进的，而是跳跃的。众所周知，在物理学中存在奇点，在那样的点上，原来的状况会转变成面对多种可能性。这样的点相当于分叉点，在现代物理学中正被广泛地研究。今天，我们无

疑正处在一个发生转变的点上。这有许多原因，譬如人口急剧增长和通讯方式发生改变。分叉点被认为是不稳定状态的结果，在那种状态下发生的微弱的效应可能会决定未来长期的进展。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这颗行星的历史可能会取决于今后若干年内国际舞台上的举措。因此，《冷战之后》充满紧迫感。

在科学上我们也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指出这一点可能是有趣的。我们正开始克服传统的科学观，从根本上说它是悲观主义的自然观，并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分裂。自然法则的概念曾经在西方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过最重要的作用。这是西方思想的一个特点。在中国的传统中，“自然”的意思是“那些自在的”。因此，怎么能说“自然的法则”呢？然而，从与牛顿定律相联系的古典物理学开始到20世纪的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自然法则的概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传统的表述同决定论和时间对称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决定论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现在，我们就能够预见未来，并且推算出过去。时间可逆性意味着现在和未来扮演同一个角色。

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把变成包括在这种自然图景中。宇宙是这样，并不是变成这样。当然，这种图景十分惬意，但为此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创造性和新奇变成了幻想。我在此刻所写的文字，在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就已经预先安排好了。理性等同于确定性，无知等同于可能性。

尽管西方科学取得了所有这些成功，但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宇宙观，它导致笛卡尔的二元论，并进而导致人类文化的二元论。在19世纪，有人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自然概念，其根据是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但是，这种“熵

的增加”意味着什么呢？在根据一本畅销书新近摄制的一部电影中，人们举出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定我们拿起一只茶杯，把它摔在地上：茶杯破碎了。我们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東西，一个茶杯，而是有许多碎片：这就相当于“无序”的出现。第二定律的本质很可能正在于无序的出现。可是，这是事情的全部吗？诚然，我们偶尔会打碎某只杯子，但是我们生产的杯子肯定要比摔的多！因此，杯子的生产是反熵事件吗？这可能是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的观点，因为宇宙惟一可以预测的状态是最大限度的无序状态——“热寂”。

幸运的是，我们正在开始克服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重要的一步是诞生了一门新的科学，关于复杂性的科学。这门科学描述发生在远离平衡的系统中的引人注目的自组织现象。这门关于复杂性的科学的结论之一是时间矢量的重要性。它证明了“时间之矢”的建构作用。此外，关于复杂性的科学涉及非线性的情况。那些基本的方程有许多解。正如费德里科·马约尔所强调的，新奇产生于飞跃，未来不是既定的。与不稳定性相联系的局部涨落，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后来的进化过程起决定性的作用。

40年前，投入固态物理学和信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可能一直只有数百人的样子。今天，这些领域的重要性已经达到可能对人类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程度。投入这些领域的专家的人数一直在激增，增长之快前所未有，包括佛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在内。

从这些领域获得了新的眼光，结果我们必须修正自己对自然法则的看法。它们现在必须被看成是表示“可能”，而不像先前那样被看成表示“必然”；而这一直就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情况。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能够准备未来。如伟

大的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 (Paul Valéry) 所言：“未来就是构建。”人类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记忆，我们对现在的分析和我们对未来的预期。这三方面都包括在《冷战之后》中了。

《冷战之后》是一篇宣言，令我们以过去的各种伟大文化传统之间进行合作的精神为下一个世纪作好准备。我们希望《冷战之后》会获得应有的注意。

I · 普利高津

目 录

序言 I·普利高津(1)

导言..... (1)

第一章 战争文化与和平文化..... (7)

第二章 个体或个人..... (21)

第三章 E Pericoloso Sporgersi
(切勿探身窗外!): 学习,
再学习..... (42)

第四章 民主..... (60)

第五章 文化的民主动力学和
民主的文化..... (79)

第六章 和平的代价..... (89)

第七章 变化着的前景..... (102)

第八章 无事如常! (122)

导 言

1988年，当第一批关于不扩散核武器和真要削减战术和战略导弹的协定达成的时候，我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了“新的一页”这个想法。世界的变化，尤其是前苏联引人注目的剧变，开始表明我们正在到达战争文明的尽头，而这种文明曾经支配所有曾生活在本世纪中期那几十年的人的生活。当然，围绕暴力建立起社会组织一直是人类迄今为止大部分历史的显著特点。

因此，1988年10月，可能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一种强大的摧毁性威力正因为它对我们人类构成极其可怕的威胁而被拆毁了。这种异乎寻常的势头，不管它是多么迟疑和脆弱，却是出现在我们接近一个世纪的终点和实际上是新的一千年的开端。此外，与冷战的结束同时

并进的是更为脆弱的民主的诞生或再生的势头，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事实上，就在柏林墙于 1989 年岁末被推倒的那天，我曾委派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代表我到非洲去同那里的五位国家首脑谈话。我希望带给他们的消息是：“自由之风现已吹遍全球，民主显然会提到非洲的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在本书中翻开的“新的一页”，是建立在民主文化基础上的和平文化的第一页。这一转变是走进一个得不到我们个人的或集体的记忆的更多指导而危险重重的未知领域。如果这一转变能够成功，我们将终于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认识，并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开始重新恢复希望和创造力。

试图准确地预测这一过程的结果会是愚蠢的（和自我限制的）举动。正如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所写的：“El hombre nunca sabe para quien padece y espera”（“人类从来不知为谁辛劳和期待”）。但是，这“新的一页”的开头显然可以由所有我们这些目前正活着的人来书写。告别战争而走向和平，这同时意味着从由国家这个在危险世界中的安全的惟一组织者支配的社会向日常生活的文明社会过渡：摆脱“战争文化”恐怖的阴影，个人在当地的社区里工作，创造和编织他们的生活。

国家和国家关系构成的国际系统将逐渐地把舞台让给非政府的、私人的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团。政府将来是起瞭望塔的作用，以确保某些基本的、民主地制定的规章得到尊重，而个人和地方社区则会越来越更直接地参与决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们将从“臣民”转变成“活动家”。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我的工作使我必须和

全世界的决策者们打交道。在过去的6年里，我已经和110位国家或政府首脑讨论过世界事务，特别是教育、科学、文化和通讯方面的问题。我曾经有机会与他们长时间交谈，知道他们都是面对令人生畏的挑战的人。我开始钦佩他们当中某些人表现的坚定信念和远大的眼光。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我都体验到他们在虚弱的决策机构中绞尽脑汁要解决难题时感受到的孤独和沮丧。即使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领袖，也经常不得不耐心地在政府官僚机构里工作，从而把采取行动的希望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拖下去。

我很清楚，我相信许多领导人也很清楚，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需要比政府内部现在拥有的更精确、更科学的知识。此外，这种知识必须用来使决策者能够着眼于长期的趋势和可能做出的选择，而不再是“勉强度过”或“胡乱对付”每个季度或每年都要发生的小危机。

现在，要紧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勇敢地接受挑战和掌握足够的知识，才有可能创造出一场新的复兴运动。每个人都要扮演一个角色，不管是处理全球问题还是局部问题，他都同样必须尽量把这些品质结合起来。我经常说：“没有知识的冒险是危险的，没有冒险的知识是无用的。”

我已经养成，并且终生困扰我自己的，可能就是担心失去美好的一天和浪费时间。大多数时候，由于没有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周围的苦难和最贫困国家里最贫困人民极度不公正的境遇，我们行动的能力变得疲疲沓沓。我们否认自己知道这些情况，逃避我们周围搏动着的生活中的挑战，安然进入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

安东尼奥·加拉 (Antonio Gala) 曾懊悔“失去的美好时

光”，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在回首往事时概括出这样一种感情：“由于太容易被影响，我已浪费掉了自己的一生。”要与这种经常是披着学术和政治的外衣在等待完备的知识和一份又一份的报告（我称之为报告社会），而实际上是在浪费宝贵的行动时间的无精打采的状态作斗争，必须要有一个造反者具备的坚韧不拔和责任感。需要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融合——最好的表达方式是我使用的一个法国双关语：“政治伦理学（pol-éthiques）”。伦理学应该给我们的政治行动注入开放性和想象力，从而促使我们迅速地行动起来，去解决诸如人口增长失控、国内和国际的大规模移民、环境恶化和贫困等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全民接受教育，尤其是妇女和女孩子。

纳尔逊·曼德拉、F·W·德克勒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西蒙·佩雷斯、亚赛尔·阿拉法特和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德和其他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显示的与众不同的品质，就是在别人还会继续犹豫不决的时刻他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从我与他们当中每个人的会晤和我自己的经验中，我懂得了，历史并不是渐进的，而是在使按常规走路的人大吃一惊和向想象力提出挑战的事件中突然迅速跳跃式地前进。

为出乎预料的情况做好准备，根除唯唯诺诺和明显的因循守旧，是所有愿意利用现在的形势激发人们复兴和平与希望的人的责任。1912年4月14日至15日夜間“泰坦尼克号”轮船的沉没是极富悲剧性的，它可能是最好的反面例证，告诉我们在盲目相信的背后隐藏着错误。当这艘巨轮载着乐队和其他人沉入深海时，乐队还在无所畏惧地演奏当时流行

的最迷人的爵士乐曲。可是事实证明，当时的技术，包括不漏水的防水舱，并不能制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当我们这颗星球面临贫困、狂热和环境恶化时，纯粹是被惯性趋动，也可以说是“按照它自身的动力学”，它创造出庞大的技术的和官僚的机构。我们在科学、技术和工业方面的成果可能因此成为我们最险恶的敌人。在由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组成的“庞大机器”面前，政治权力，甚至我们个人的影响力，似乎都对它无能为力了。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一系列为了生存而与自然进行的斗争，那么今天人类面对的却是他自己的成果和他自己造成的危险，这远远超过了自然系统给他自己造成的危险。要写出新的一页，我们必须重新献身于和平的道义力量，而不是战争的强制力量。尽管联合国有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的方面，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正在力求创造联合国的道义力量，而不是创造一个由军事力量构成的联合国。只有在地方、在国内、在国际造成一场新的复兴运动，我们的认识和行动才能决定未来事物的形态。

追求发展要坚持一条原则，那就是尽量要把世界上所有不同国家里的所有多样性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而又保留他们所有的多元性，否则就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衰退。宽容最终是一条原则，是我们寻求事态和问题的本质（最先的性质）作为共同行动的基础的原则。塞内加尔总统迪奥夫（Diouf）曾写到：“通向现代性的道路叫做坚持。”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坚持我们梦想中的和理想中的。“因为我仍然在想，在梦，而想和梦从来不会完全落空”，诗人乔斯·伯格明（Jose Bergamin）曾说过。

我希望“新的一页”真的会写出来。若干年前，西方相

信它掌握着解决办法。世界的其余部分也相信西方有解决办法。但结果是“灯塔”只能照亮在经济方面很有限的一个范围，而且是在短时间内，在此之外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们都接受过重要的教训，必须随时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小心翼翼地摸索。

在任何层次上政治都肯定不是“可能做到的事的艺术”。实际上政治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反叛，天天追求把道义付诸行动，并把梦想变成现实。1966年，罗伯特·肯尼迪曾到南非去，对这个处于困境的国家的青年男女面对面地讲话。他说：“人类的历史是由无数出于勇气和信念而采取的行动塑造成的。每一次，当一个人为了理想而站出来，或用行动去改善许多人的处境，或挺身反对非正义，他都掀起一层希望的微波，这微波在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活力和勇气的中心激荡，汇集成一股巨流，足以冲决阻拦它的最牢固的堤坝。”罗伯特·肯尼迪没有活到看见我们这个时代，但我们有责任掀起这样一层波澜，让它汹涌地冲向未来。

费德里科·马约尔

第一章

战争文化与和平文化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个物种同它赖以生存的星球的关系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我们正在被迫重新认识“时代”，它正在以一系列急剧的、速度加快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环境的事件改变我们对作为共同体和个体的我们自己的认识，并向我们控制全球趋势的信心提出挑战。

这些变化的速率和方向正以同样重要的方式改变我们对周围人和自然的环境的认知系统。由于一系列越来越多的出人意料的有意义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格言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信息超量，系统变质。”但是，系统并不是按整齐划一的或有反思的方式发生形态变化。许多系统继续相信未来是安全的，同

“已知的”过去是一样的。其他系统则陷入迷惘、悲观和绝望。

作为科学家、教育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人，从个人的有利地位出发来写作，我很愿意在这几页中自言自语地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作为一个担任公职的个人说出来。在此我的观点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而是凭借每天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独特视角，凭借我的职务对我的要求，凭借从地方到社区再到国家最后到国际的职业经历造成的结果。

在我的故乡加泰罗尼亚，我的祖国西班牙，生活变迁的经历使我相信，我们的世界可能面临一次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机会——迅速地从“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的机会。在一种近乎是永久性的为冲突而动员的气氛中形成的习惯、原则、认同，当然还有投资，现在正在趋于改变。“安全”正被作为一个公民个人的，甚至是科学上的问题重新定义，而不像不久那样是事关导弹弹头和发射系统。

在1989年行将结束之际，对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祝转变成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突然迅速推进的年代的重现。整个国家共同体——大多数是和平地，摆脱了一种本来好像会持续好几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事实上，当遇到对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生活的渴望大规模的、和平地喷发时，那些极权主义的制度，连同其对信息的控制、对私人和公众生活的细节都要监督和控制的体制（实际上是宗教仪式），以及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力量便一下子土崩瓦解了。甚至当那些政权中最残忍和个人化的政权（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的政权）做垂死挣扎而转向暴力时，它自己的军队和党也抛弃了他，联合起来保卫民众的抗议。

东欧的这些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苏联本身已经

开始实施一项大胆的改革和民主化的纲领。西方的领导人致力于推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而只要两个集团之间的对话在继续，裁军便为未来提供一种新的意料不到的前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45年的、在“相互确保毁灭”基础上的武装休战，正在被一种新的建立在“相互检查武器控制”基础上确保安全的方式取代。

当东西方各国政府能够开始考虑“和平预算”和“和平分红”时，新的要求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经日渐紧迫地涌上前来。与民主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成长平行的是广泛扩散的发展危机的威胁，债务、原材料价格和其他因素正在抵消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在增长和生活标准提高方面的进步。贫困正在最贫穷的国家里生长；学校系统经费不足，不够教育新一代；在过多的地方，饥饿儿童和年轻文盲的数目在继续增大。两极世界的终结又带来了在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和索马里国内的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加剧，维持和平提上了联合国的议事日程，而这些以前从未有过。

与此同时，南半球“贫困”和北半球“先进”的后果引起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发生变化，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在最先进的国家里，矿物燃料没有充分燃烧，而那些住在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村庄和贫民窟里的人，为准备粗劣饮食果腹，天天必须砍树烧火。这些因素正结合在一起，加速全球变化趋向于一个千真万确的不可逆转的点：作用于全球空气、海洋和气候的温室效应。

“不可逆转的点”这个观念一直被用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如此有影响，以致我们不能不下大力向公众和决策者们说明这个观念同科学事实的相关性。天才的预言家阿西莫夫和泽拉兹尼（Zelazny）以及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和斯